

俄国民粹派 小说特写选

上



外国文学出版社

540272

俄国民粹派小说特写选

上



01182539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俄国民粹派小说特写选(共两册)

Eguo Mincuipai Xiaoshuo Texie Xu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66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5\frac{3}{8}$ 插页 4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530

书号 10208·275

定价 6.05 元

序 言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特点，这就是它和革命运动的直接联系。从十二月党人到别林斯基、赫尔岑，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到七十年代的民粹派，这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家都亲身从事文学活动。他们或写诗做小说，或办杂志作评论，力图通过文学提出时代的迫切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俄国文学表达人民心声的自觉性，使俄国文学反映了俄国人民海洋般深广的苦难和烈火般炽热的对光明的追求。这是俄国文学的骄傲。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对在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金钱关系压迫下备受煎熬的农民怀着赤子般的真诚同情，但他们通过“村社”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却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这个运动既未得到农民的热烈响应，又受到沙皇当局的残酷镇压，只能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后，一批不屈不挠的战士想通过“个人恐怖”手段来摧毁专制制度，其结果是“以卵击石”。到八十年代，民粹派运动发生分化：有的蜕变为自由派；有的虽继续坚持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但同时反对当时在俄国开始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少数优秀分

子批判了民粹主义的错误，成了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历史。

诚然，民粹派运动没有造就出俄国第一流的诗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和大致同时代进行创作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这些文学巨匠相比，民粹派作家在自己作品里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不止是略逊一筹，甚至和他们自己光照青史的革命活动相比，他们的文学业绩似乎也略显黯淡。然而，无论是在开拓新题材，还是探索新的体裁及表现形式和发展文学语言这几个方面，民粹派作家对俄国文学的发展都作出了独特的、不应被忘记的贡献。

这种贡献首先是对人民，主要是对农民生活的描写。民粹派作家们本人都对农民生活状况的各个方面进行过认真细致的实地调查。诚如尼·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所说：“我们当初曾经下过一番什么样的功夫啊！我们伸手去掂量农民的粥罐、汤盆、酒杯和口袋，我们钻进猪圈牛棚，清点牲口的头数和粪肥的车数，我们向乡村酒店老板和税务官员索取资料，来去匆匆地参加村社的集会，调查村社的饮酒量。我们踏遍耕地和牧场，迈着步子丈量土地，测绘地形图……我们真是什么都用鼻子闻过，用尺量过，用秤称过。”^① 在一个时期内，一大批作家如此热心了解农民生活

^① 转引自《十九世纪七十——九十年代俄国中篇小说集》，第1卷第8页，苏联国家出版社，1957年版。

的一切方面，并以反映农民的生活和心理，探索农民摆脱困境的途径为自己创作的主要宗旨，写下大量作品。这确实是俄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是七十年代民粹派运动在俄国文学史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本来，农民问题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仅以十九世纪下半期而论，也许除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大作家不曾涉足这一领域。但是，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和《木木》之后把注意力集中于捕捉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新征兆，未再回到农民题材上来。契诃夫写过几个关于农民的短篇，但这毕竟不是他得心应手的天地，其中难得发现他在传达俄国腐朽现实之令人窒息的气氛时所留下的神来之笔。托尔斯泰是改革后到一九〇五年革命约半个世纪间千百万俄国宗法农民情绪的表现者，不过这种表现是通过他心爱的题材——一个贵族的自我忏悔——实现的；不论是《安娜·卡列尼娜》，还是《复活》，处于画面中心的主要还是京城和外省高层贵族与官僚社会的生活。民粹派作家，就个人而言，很少有人可以在文学史上独占一席之地；然而合在一起，他们却提供了比其他任何大作家所提供的更为丰富、全面、细致的农民生活画面，从而大大增强了俄国文学的民主主义精神。高尔基曾高度评价民粹派文学在描写人民生活方面所作的努力，他说：“民粹派小说家为认识我国的经济生活和我国人民的心理特征提供了浩瀚的材料，他们描绘出人民的风俗习惯、情绪和愿望。”^①

①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第38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村中的新阶级——商人和富农得到迅速发展。这些暴发户没有世袭贵族们的温文尔雅的“教养”，榨取农民血汗时却十分老练，他们的贪婪凶残也表现得毫无遮拦。帕·扎索津斯基(1843—1912)称他们是“象臭虫一样靠吸血养肥自己的新人”，是新时期的“当代英雄”。尼·纳乌莫夫(1838—1901)有名的短篇小说集《胳膊拧不过大腿——西伯利亚农民生活的故事》(又译《弱不敌强》，1874)就刻画了各种富农的嘴脸，描绘了农民在资本主义金钱关系桎梏下走投无路的悲惨处境。纳乌莫夫出生于西伯利亚一个小官员家庭，自幼贫困，他自己说：“由于命运的安排，我从幼年时代起所看见的就只有一幅幅人类受苦受难的悲惨图景。”^①一八六一年，他因参加学潮被从彼得堡大学开除，此后因参加民粹派活动多次被捕。《鱼市》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短篇小说集中的一篇，描写农民被迫按极苛刻的条件低价卖鱼，高价买日用商品，结果终年辛劳、负债累累的绝望处境。商人彼得·马特维伊奇与村吏勾结，垄断农村贸易，他的贪婪、狡猾和骄横被勾画得活灵活现。《刺猬》(1873)和著名的特写集《罗网》(1880)则写西伯利亚金矿工人的生活。这些工人实际上是为债务所迫外出做短工的农民。矿上沉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折磨着他们的肉体和精神。然而，在做完一季短工返回家乡时，他们那渴望得到休息和轻松的最最起码的合乎人性的愿望却

^①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编十卷本《俄国文学史》，第9卷，上册，第375页。

被引入歧途：富农、商人、酒店老板已经为他们布下新的“罗网”，引诱他们去酗酒、赌博、放纵作乐。一觉醒来，他们才发现自己辛苦挣来而又几经盘剥所剩无几的血汗钱已被诈骗干净，于是不得不重新回到矿上，继续地狱般的苦役生涯。《鱼市》中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卡利宁和《刺猬》中的卡尔波夫是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他们试图号召众人团结起来斗争的努力或因响应者寡，或因当局出动武装而告失败，但作者对他们的赞赏是显而易见的。普列汉诺夫曾专门撰文论述纳乌莫夫这些短篇的意义和影响，他说：“在七十年代，尼·伊·纳乌莫夫在我国民粹派（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最先进阶层中享有巨大的声誉。人们读他的作品读得入了迷。他的《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个集子获得了特别的成功。”^① 纳乌莫夫描绘的西伯利亚人民生活画面在俄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当代苏联文学中已形成有一个有鲜明特色的“西伯利亚文学”，如果溯本求源，当自纳乌莫夫始。

《鱼市》中的商人是外来户，这和民粹派否认农民内部两极分化的必然性的理论是相一致的。彼得·马特维伊奇固然通过买卖关系盘剥农民，但他之所以能独霸鱼市，恰恰是由于商品经济在农村尚未充分发展。纳乌莫夫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从抽象的道德观念出发，把资本主义看成有

^① 引自《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1卷第127页，人民出版社，1983

百害而无一利的恶，为了消除这种恶，要寄希望于唤醒泯灭的良心。因此，他在八十年代写了一个富农迷途知返的故事（《忏悔者》）。此后他创作中的批判锋芒日渐减弱。

格·乌斯宾斯基（1843—1902）的名字对我国读者并不陌生，他六十年代的成名作《遗失街风习》早已有中译本。七十年代，格·乌斯宾斯基两度出游西欧，与流亡的民粹派革命者交往密切，思想上受他们影响。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的情景和伦敦工人的悲惨处境使他极度震惊。回国后，他虽未参加民粹派活动，但决心定居农村，研究农民生活，试图在资本主义道路之外寻求俄国的出路，创作的题材也转以农民生活为主，重要的作品有短篇和特写集：《新的时代，新的忧虑》（1873—1878）、《乡村日记》（1877—1880）、《农民和农民的劳动》（1880）、《土地的威力》（1882）等。《支票簿》（1876）是《新的时代，新的忧虑》集中的一篇。从改革后俄国农村出现的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中，格·乌斯宾斯基抓住了“支票簿”这个“新”事物，把它作为艺术细节，赋予它以象征性的内涵。这说明作家对现实有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理解。米亚斯尼科夫这个新型资产者踌躇满志的心理通过他拿着支票簿洋洋自得的神气生动地揭示出来。“支票簿”使沉睡的森林和成群的牲畜变成木材和肉类、油脂，它们产生新的“支票簿”，“支票簿”又投入新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大片村庄和农舍被毁灭，农民则变成以戈比和卢布计价的劳动力。格·乌斯宾斯基对农民人格价值的丧失十分痛心，但他知道，任何感伤的叹息都不能阻挡和改变这个

过程，他的笔调在嘲讽之中露出冷峻。《土地的威力》真实地描绘出宗法制村社瓦解和农民两极分化的过程，从而“完全不自觉地对民粹主义以及一切哪怕部分地与之有关的‘纲领’和实际活动计划宣判了死刑”^①，但它的激情主要倾注于对“土地的威力”的赞颂。格·乌斯宾斯基在寻求使千百万农民摆脱苦难的途径时，其思想仍然没能脱离民粹派理论的轨道。在他看来，光脚板伊万的堕落是被“自由”惯坏的结果。因此，应当采取措施，使农民不脱离土地，永远务农，因为土地才是农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力量的源泉。他满怀热情地写道：“只要人民还在土地的威力控制之下，只要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生存还不能不听命于土地，只要土地的命令主宰着他们的理智和良心，而且充斥他们的生活，那么绝大多数俄国人民就会耐心而坚强地承受不幸，就会始终天真烂漫、勇敢刚毅，温顺如赤子，肩负人间一切重担……我们的人民只要从头到脚，从外到里，全身都沐浴和浸透着土地母亲散发的光和热，就会保持本色，就会具有理智和心灵的一切可贵品质，总而言之，就会保持他们的天性，甚至保持他们的原形。”格·乌斯宾斯基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他当时没能象二十多岁的普列汉诺夫那样批判民粹主义并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只能由历史老人去抱憾，但今天的读者仍能在他热烈的探求中再一

^① 引自《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1卷第3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次触摸到俄罗斯文学的良心的跳动。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农村阶级分化日益加剧和人口不断外流的八十年代的俄国，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使农民不受金钱“魔鬼”的诱惑而听命于土地的威力呢？格·乌斯宾斯基终究只能为“回天乏术”而深深地苦恼，这正是他从九十年代起失去精神平衡，神经错乱逐渐加剧，终于不治身亡的根本原因。

《黑暗势力》(1870)的作者帕·扎索津斯基(1843—1912)和大多数民粹派作家一样，一生贫困，对社会有深切的亲身感受。他写道：“对我来说，整个人类都分成两个不平等的集团：一方面是亿万饥肠辘辘、衣不蔽体的不幸的穷人，另一方面是为数不多，然而却是富丽堂皇、洋洋自得的一小撮有福的阔老……我把我的全部同情给了前者，把我的全部憎恨的感情给了后者。”^①扎索津斯基的全部创作都贯穿着这种民主主义的精神。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斯摩林村纪事》(1874)。作者虽然宣传民粹派的“村社”理想，而他笔下的“村社”却是农民同商人及富农进行斗争的武器。书中贫富两方对垒鲜明，争斗激烈。这种场面在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是看不见的。斗争的失败客观上又揭示了“村社”理想的虚幻性。《黑暗势力》以饱含同情的笔触描写外省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们由于痛苦和不幸成了惯常现象而变得麻木和失去同情心，甚

①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编三卷本《俄国文学史》，第3卷第499页，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至把死亡当成理想的归宿。阿廖沙的道路则意味着人民中蕴藏着的斗争精神的觉醒。

在描写人民生活的民粹派作家中，斯·卡罗宁（本姓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基，1853—1892）可说是独树一帜。他的一生是备受迫害、历尽艰辛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一生。由于家贫和“政治不可靠”，他连中学都没有毕业。一八七四年，因参加“到民间去”运动被捕，从此开始长期的流放和铁窗生涯，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以三十九岁的盛年，死于结核病。生前他曾与青年高尔基会面和交往，他当时对民粹派的一些错误观点已持批判态度，这对高尔基的思想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高尔基后来在回忆录中称他是“真诚相信人民拥有能够创造奇迹的无穷力量”^①的作家。

卡罗宁着重挖掘农奴制改革后二十年间农民心理的变化，即他们由满怀希望到幻想破灭，由麻木混沌到开始觉醒的过程。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巴拉什卡村人故事集》（1879—1880）和《琐事集》（1881—1883）。巴拉什卡村的农民在宣布农奴制废除之日又惊又喜，但不久就发现，“改革”不过是无穷无尽的新苦难的序幕，他们终年陷入由饥饿、债务和各种屈辱织成的“琐事”的罗网中，无法摆脱。残酷的现实终于使他们认识到，“村社”并不是可以对抗富农进攻的堡垒，而是必须从中逃走的监狱，于是决定集体出

① 引自《高尔基文集》（三十卷集），第10卷第306页，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

逃。卡罗宁在《兄弟俩》(1881)等短篇中也揭示了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发展必然导致“村社”制度的解体。高尔基盛赞他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他说:“他是多所预见的,他的一些见解如今证明都是预言……”^① 1881—1886, 基列汉诺夫

有些民粹派作家把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城市文明当作一种抽象的“恶”来谴责(这也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内容),总是写农民一进城就堕落。卡罗宁则更富于历史感。他的中篇小说《自下而上》(1883—1886)写农民卢宁进城当工人后的思想变化,是俄国文学中最早表现工人觉醒的几部小说之一。卢宁携未婚妻离开家乡不仅是贫困所迫,而且还因为精神苦闷。这是同时代其他作家很少涉及的题材。卢宁到处流浪,几经波折之后在一家工厂当司机助手,建立家庭,尚能温饱。但他不满足于个人的小康生活,开始读书,思考更深更广的社会问题,为不知如何才能使全体人民幸福而十分苦恼。卢宁进城当工人后没有堕落,而是变得更加聪明和高尚,从单纯追求个人幸福转而思考全体人民的命运,这是个重大的变化,是俄国生活底层深处出现的新征兆,它意味着俄国正在酝酿着一场“自下而上”的变革,普列汉诺夫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小说标题的意义的。十九世纪末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契诃夫、柯罗连科等都在自己的作品中以不同的方式透露了这个时代的新信息,

① 引自《高尔基文集》(三十卷集),第10卷第307页,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

这是文学对历史大风暴的敏锐的预感。普列汉诺夫对卡罗宁的这种敏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卡罗宁先生的特写和短篇小说的主要优点在于，它们反映了我国现代社会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旧的农村制度的瓦解，农民的天真心境的消失，人民走出自己发展的儿童时代，人民身上新感情的出现、对事物的新看法及新的智力需求。平凡的小说作品提供者是决不会发现这样深刻和高尚的主题的。”^①

卢宁的苦恼同时也是卡罗宁和俄国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苦恼。高尔基在九十年代一些流浪汉小说和中篇小说《三人》里也表达了对另一种更美好的生活的热烈向往和被平庸猥琐的现实所窒息的苦恼。高尔基的探索最终使他塑造出了崭新的文学主人公。卡罗宁没能做到这一点，或者这也应当归因于他过早的去世吧。

民粹派作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们在一系列小说（短、中、长篇）和回忆录中，留下了七十年代民粹派革命家的动人形象。

尼·费·巴任（1843—1908）出身于退伍中校家庭，一八六二年毕业于沃龙涅日武备中学，一八六四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斯捷潘·鲁列夫》，此后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二十五年。八十年代后，他的创作呈悲观主义色彩。《斯捷潘·

① 引自《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1卷第76—7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鲁列夫》被认为是描写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重要作品之一，其主人公身上明显具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拉赫美托夫的性格特点。和巴任写的其他一些中、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鲁列夫是六十年代的人物，是七十年代民粹派革命家的前身，正在为迎接斗争的风暴进行准备，这个百折不回、一心同一切社会寄生阶级对抗到底的革命者形象，在当时有一定社会影响。

尼·兹拉托斯拉夫斯基（1845—1911）出身于小官吏家庭，中学时代酷爱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的文章。曾就读于彼得堡工艺学院，因家贫辍学。一八六〇年起为《祖国纪事》杂志长期撰稿，直到该杂志停刊。八十年代在民粹派杂志《根基》上发表作品，主要揭露农村黑暗，同时也表现城乡对立，受托尔斯泰主义影响。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根基》（1878—1883），赞颂和美化八十年代在资本主义关系冲击下迅速崩溃的“村社”。中篇《金子般的心》（1878）则是写平民知识分子。莫罗佐夫代表已经“过时的”六十年代的“新人”，与之相对的是怀着“金子般的心”的巴什基罗夫，他对政治、社会问题不感兴趣，热衷于个人的道德完善。在兹拉托斯拉夫斯基看来，只有巴什基罗夫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和人民结合。民粹派运动到八十年代逐渐失去其民主主义的斗争精神，向自由主义蜕变，兹拉托斯拉夫斯基的作品恰恰反映了这种蜕变。

安·奥西波维奇（本姓诺沃德沃尔斯基，1853—1882）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中学毕业后开始以授课为生，一八七

二年曾在基辅大学数学系，因经济困难未能读完大学。一八七七年起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作品，受到谢德林的注意。他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二十九岁死于肺病。短篇《一段故事》(1882)写法虽较隐晦，却透露了七十年代沙皇政府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的信息。主人公是当局追捕的对象，但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工人伸张正义，号召他们起来斗争。小说发表于革命运动转入低潮的八十年代初，写出这样一个人物表明作者仍然坚持革命的信念。

瓦·约·德米特里耶娃(1859—1948)出身农奴，是十九世纪少有的女革命家兼作家。她七十年代开始参加民意党人活动并从事文学创作，多次遭受迫害。中篇小说《志愿兵》(1889)表面上写去塞尔维亚参加俄土战争的“志愿兵”，实际上是赞扬七十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也许正因为取了这个篇名，小说骗过了审查官的眼睛，居然能在当时公开发表。作家有幸活到八十九岁的高龄，在十月革命后仍长期从事写作，较著名的有自传性小说《往事》(我的生活道路—1930)。

在塑造七十年代革命者形象上成就最大的是斯捷普尼亚克(本姓克拉夫钦斯基，1851—1895)，他的富于传奇色彩的职业革命家的一生也特别值得称道。他出身军医家庭，大学时代以拉赫美托夫为榜样，苦练筋骨，为进行残酷斗争作准备，并为尽早开始行动自愿退学，与克鲁泡特金等人组织民粹派最初的秘密团体之一“柴科夫斯基”小组。他是“到民间去”运动发起者之一，曾因在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

被捕；流亡国外时又先后参加过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人民（1875）和意大利人民（1877）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回国后多次组织政治犯越狱，以勇敢、机智著称。一八七八年八月十六日，他在彼得堡市中心广场上于众目睽睽之下刺死俄国宪兵总长梅森卓夫并顺利逃走。此后他再度流亡国外，在法国和英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八十年代民粹派开始分化后，他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过从甚密，但不肯参加劳动解放社。他居住英国时曾与恩格斯会晤并通信，并以自己的革命活动得到革命导师的赞许。九十年代初，斯捷普尼亚克公开著文批判自己过去实行过的个人恐怖主义。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他因疏忽大意丧生于伦敦郊外疾驰的火车轮下，年仅四十四岁。

斯捷普尼亚克的作品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回忆录，以《地下俄国》（1881）为代表，其中既有一些著名革命者（如克鲁泡特金、索菲娅·彼洛夫斯卡娅、维拉·查苏利奇）的肖像剪影，也有一些无名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的真实记录，在十九世纪俄国回忆录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第二类是小说，以长篇《安德烈·科茹霍夫》（1889）和中篇《伏尔加河畔的小房子》（1892—1893）最为有名。这些作品都是作者流亡国外时最初用英文写成发表的。由于不受沙皇审查机关的限制，他在描写革命活动和抒发革命情怀时要比俄国国内的民粹派作家大胆和自由得多，所以他笔下的革命者的形象也更加丰满、完整。